

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

——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李树茁^{1,2}, 徐 洁^{1,2}, 左冬梅^{1,2}, 曾卫红^{1,2}

(1.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安交通大学 老龄与健康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本文基于对当前转型期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祉现状的认识, 探讨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研究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生活福祉脆弱性的形成与特点、养老模式的形成、演化与变迁的途径和规律, 探索农村家庭养老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本文用生计来研究老年人福祉, 并建立了农村老年人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研究和实践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农村老年人; 生计; 福祉;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家庭支持政策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7(04)-0001-10

一、背景

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快速城镇化,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 孝文化观念转变, 家庭规模缩小, 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与农村老年人福祉相关的种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老年贫困, 孤寡, 生存质量下降等一系列社会现象层出不穷, 农村老年养老脆弱性凸显。建立在依托土地之上的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着制度性瓶颈和冲击, 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 而老年群体规模日益壮大, 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截至 2015 年底,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22 亿, 占我国总人口的 16.1%, 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 48%。农村老年人口生计与福祉的

可持续性尤为重要。

农村养老脆弱性是社会变迁以及生命周期过程中风险积聚和累计的结果, 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 使得农村老年人福祉更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潜在风险。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寻找农户生计脆弱性原因并提供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和建设性工具, 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开发和生计建设项目评估中得到广泛应用和实践^[1]。生活福祉代表经济、健康、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影响人们生活条件的因素。养老脆弱性作为老年人生活福祉方面的固有特征, 是农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一系列生计资本、制度性支持、面临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风险而导致的结果。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资本的多

收稿日期: 2017-07-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利的动态演进及家庭支持政策研究”(71573207); “农村老年人扩展型家庭体系内代际支持机制及老年人健康后果——基于 13 年的大样本追踪”(71273205)。

作者简介: 李树茁(1963—), 陕西省西安市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价; 徐洁(1988—), 女, 陕西省延安市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老年学; 左冬梅(1973—), 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老年学; 曾卫红(1968—), 女, 福建省惠安县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健康经济学。

本刊网址: <http://jjkx.xjtu.edu.cn>; <http://www.ddjjkx.cn>

1

寡影响到老年人生活福祉的水平,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资本的匮乏是养老脆弱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国内外学者主要使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讨失地农民、农村农户生计及反贫困问题,直接探讨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与福祉可持续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生计问题的研究^[2],以及生计资本视角下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研究^[3],是目前直接将可持续生计概念应用到老年人问题的有益尝试,但都不是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系统研究。尽管老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社会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老年问题相关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障政策亦相继出台,然而学术界针对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祉的可持续性关注度不够。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引入,将以个体为中心的老年问题研究拓展到以家庭为单元,是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领域的有效拓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本文在剖析农村老年人养老脆弱性和生计可持续性风险现状的基础上,深入识别和挖掘其背后的诱因、动态演进和传导机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可以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和家庭支持政策,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对于解决现阶段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养老困境,以及缓解未来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动态转型过程中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压力和降低老年人福祉不确定性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民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在描述当前转型期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与福祉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用于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从农村老年人三代扩展家庭微观行为机制的角度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脆弱性的形成与特点、养老模式的形成、演化与变迁的途径和规律,探索农村家庭养老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同时,揭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政策需求,寻找支持政策体系的结构性框架和突破口,实现对农村老年人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应用与实践。

二、农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计与福祉现状

(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在生计和可持续生计概念的基础之上,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者发展了多个生计分析框架,并用于

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户的贫困、风险、脆弱性、性别等行为与策略,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把对贫困的新理解集成到一个分析性工具之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生计的复杂性和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为在实践中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有效思路^[1,4],使用最为广泛。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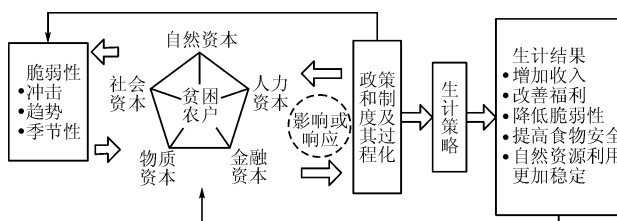


图 1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农户作为是在脆弱性环境下谋生的拥有一定资本的对象。家庭或个人的生计资本是理解家庭或个人的拥有选择的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所处的风险环境的基础^[5-6]。不同农户的五类资本在数量和结构上都可能存在差异,并且不同生计资本之间可能具有转换关系和一定的动态性。脆弱性在 Moser 看来是指个人、家庭和社区由于缺乏一系列资产而面临的生活风险的增加^[7]。脆弱性环境制约着农户对资本利用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即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策略是动态的,脆弱的生态环境、影响生计的制度和政策的外部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都会影响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活动的实施。

图 1 可以看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农户家庭为研究单元,用一个二维平面图来展示生计构成的核心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8]。在制度和政策等因素造就的脆弱性环境中,在资产与政策和制度相互影响下,作为核心的生计资本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产,影响资产的性质和状况^[8]。可持续生计框架强调宏观政策与微观农户个体的联系,将生计策略形成、影响及其后果的理论与降低风险冲击及消除贫困的实践相结合,是研究和改善农户生计的可行范式。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涵盖了生计资本、生计后果、脆弱性环境等核心要素,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的

生计与福祉,则需要对当前转型期农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计资本现状、生活福祉、所处的脆弱性环境、现有家庭政策有所了解。

(二)农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计与福祉

1. 农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计资本现状

自然资本是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耕地是农村家庭主要的自然资本。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截止到 2009 年底,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 1.52 亩,与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相比人均下降 0.07 亩;而截止 2013 年底,农村耕地流转 3.4 亿亩,比 2008 年底提高 2.1 倍^[2]。土地流转的快速发展,人均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家庭自然资本的脆弱性,可能造成农村老年人收入的降低。同时,受到其家庭耕地面积的影响,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由 2010 年的 335 万人增加到 2016 年 10 月的 17649 万人^[9]。土地流转快速发展过程带来的耕地面积减少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年人家庭以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本匮乏,土地的保障作用减弱,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脆弱性增加。

物质资本是家庭成员赖以生存的基础,住房是主要的物质资本。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社会活动空间逐渐缩小的同时,他们对住房的需求和依赖程度相对增加。住房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能否安心养老的物质基础,是老年人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最必要的条件^[10],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福祉。农村老年人拥有房产的比例低于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基本小康水平也低于城镇老年人^[11]。住房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拥有权或面积问题,它影响到老年人生理、心理、安全等多方面基本需求的满足。调查显示,截止 2015 年,中国近 2 成的老年人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中有 58.7% 的城乡老年人认为住房不适合,在农村老年人中这一比例高达 63.2%^[12]。以住房为主的物质资本的数量不足与质量问题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产生直接影响,严重制约了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资本是家庭经济保障的基础,家庭经济保障需求是人们面临的最基本的养老需求。经济保障是老年人生活福祉的决定性因素。农村老年人金融资本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老年人养老的脆弱性。2010 年调查显示,我国农村老年人平均

年收入为 4756 元,其中,社会养老保障 890 元,仅占 18.7%,收入与社会保障水平均处于极低的状态^[13]。由于农村老年人自养能力不足,经济依赖性相对较高。2010 年第 6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47.74% 的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比城镇老年人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家庭金融资本极其匮乏,收入结构单一,稳定性差,抵抗风险能力不足,家庭养老脆弱性凸显。

人们晚年阶段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先期获得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受教育水平。第 6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的老年人中超过五分之一的老年人从未上过学,近一半的老年人仅仅是小学文化程度。由于历史、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以及城乡二元格局的长期存在,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该弱势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体现尤为深刻。教育虽然是先期生命周期中发生的事件,但却会影响人们的终身发展。一般来讲,受教育程度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就业、收入以及家庭和社会地位。人力资本劣势积累到老年时期,使较大比例的农村老年人生活在经济困难和缺乏社会保障的境遇中,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于个体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也是一种社会支持。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纽带表现出强连带的特征,与亲戚、邻里和原村人交往是农村人最重要的交往关系。而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个人的健康与福祉^[14-15],对老年人福祉有重要影响。对农村老年人而言,社会网络更局限于家庭内部,拥有除家庭以外社会网络的比例极低。有调查显示,当老年人需要借钱时,72.6% 的农村老年人会向子女求助,高于城镇老年人 12 个百分点^[11]。社会网络的单一性和依赖性意味着农村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匮乏。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人口流动常态化等的快速发展,农村传统养老保障弱化的同时,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不能起到补位作用,农民养老的脆弱性特征会逐渐表现出来,最终导致养老困境的出现。

农村老年人家庭五大生计资本总体匮乏,资本结构失衡,金融资本处于极其匮乏状态。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对于家庭生计的维持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基础,物质资本的匮乏实质上反映的是金融

资本的匮乏。同时,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资本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可持续生计能力差,抵御风险以及生命历程中重大事件冲击的能力十分有限,需要强有力的外部干预。

2. 当前农村老年人家庭生活福祉现状

生活福祉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健康、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影响人们生活条件的非经济因素^[16],生活福祉应该是建立在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综合的基础上^[17-18]。老年人经济状况、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等生活现状的一系列维度是老年人生活福祉的主要反映。老年人患病状况是检验老年人生活福祉状况的最直接指标。调查显示,2006年老年残疾人占总残疾人53.2%;2015年,全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8.3%,总数约为4063万人^[12],预计未来失能老人增加到2053年的1亿^[19]。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失能率高于城镇。这是由于农村物质生活条件较差,老年人通常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也与农村医疗保障水平较低,老人因病致残,因残失能较多有关^[20]。无论是家庭还是机构提供照料服务,老年人的照护需求是刚性的。根据对中国民政网站发布的数据推算,我国目前在机构中照料的失能老人只有10%^[20]。我国机构床位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农村残疾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更加严峻。随着人口老龄化,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病已占据了疾病谱和死亡谱的首位,成为农村老年人健康的最主要疾病。预计未来中国老年人的慢性病患者病例将从2013年的1.1亿增加到2050年的3亿^[19]。抑郁是反映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近一半的农村老年人患有轻微及以上程度的抑郁症,其抑郁程度显著深于城镇老年人^[11]。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程度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的脆弱性存在着长期性、多样性等问题。

(三)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养老脆弱性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给农村老年人及家庭的福祉状况带来了更多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农村养老脆弱性凸显。农村养老脆弱性是由农村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保障体系特征等因素决定,使农村老年人生活极易在内部风险冲击或外部风险扰动下而遭受福祉损失或陷入养老困境的一种属性或不稳定状态^[21]。改善农村老年人

福祉,避免其陷入养老困境,最重要的是降低农村老年人养老脆弱性。农村老年人养老具有多维度和多层面性,这决定了农村老年人养老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体的研究。因此,实现老年人养老需要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以“家庭”为单位所形成的养老保障网就是这种共同努力的载体。农村老年人养老脆弱性的高低取决于这种保障网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而保障网的保障能力与养老风险博弈结果的表现形式则是养老脆弱性显性化。

养老脆弱性由多种因素导致。首先是个人特征因素,表现为人口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无偶老人相对来说抵抗风险能力差,养老脆弱性较高。其次是家庭特征因素。作为一种家庭单位的社会经济行为,家庭特征因素对于养老脆弱性程度的高低有重要影响作用,农村家庭拥有的资本总量对农村老年人养老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加大了农村老年人养老的脆弱性。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导致农村家庭收入潜力降低,农村家庭保障能力下降,农村养老脆弱性增加。第三是保障体系因素。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包括传统的土地保障、家庭保障、现代养老保障体系等。从土地保障角度来看,土地作为自然资本一直承担着农村老年人重要的生活保障职能。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土地的保障作用正在迅速削减,表现为土地数量减少、土地收入占家庭收入趋少等。家庭保障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支撑,家庭的生计资本是农村老年人家庭保障的基础。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家庭规模的急剧缩小以及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急速转变,传统意义上作为养老资源主要提供者的家庭,自身的保障功能逐步弱化。最后是养老脆弱性的社会转型因素。中国正经历着人口、社会、经济等多重结构转型交织的重要时期,多重转型所带来劳动方式的转变、社会关系的变化、家庭功能的转移、养老观念的改变对于家庭保障能力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养老脆弱性也是农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养老资本、制度性支持、面临自然和社会风险等而导致的老年人生活福祉方面的固有特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保障网的保障水平、保障能力与养老风险博弈的显性化结果。农村养老实质上是

农村老年人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问题^[21],降低农村养老脆弱性需要实现农村老年人的可持续生计,从而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福祉。

(四)现有的家庭支持政策

中国经历人口与社会的双重变迁,家庭自我保障能力和发展能力在不断弱化、外化和社会化,家庭生计资本的匮乏导致家庭无法为家庭成员提供传统意义上的有力支持,尤其是老年人家庭的需求更为迫切,老年人生活福祉具有脆弱性和风险性。老年人家庭对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强烈且持久的^[22]。探寻社会化解解决途径最有效的手段即是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家庭支持政策。同西方家庭支持政策的兴盛和家庭政策研究的繁荣相比,我国的家庭支持政策及其研究相对滞后。我国直接或间接涉及家庭支持政策大多专注于问题家庭,对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政策提及甚少。相对于普通家庭,老年人家庭的生计与福祉问题具有脆弱性与多样性特征。与西方国家不同,家庭在中国不只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还是秩序单元、教化单元和福祉单元,并负有社会化和保护其成员的责任。在人口与社会双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对家庭模式实施了强制性干预,并对家庭关系和功能进行了功利化的操作,使得中国家庭在制度层面被高度工具化,却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家庭自身的发展^[23]。

我国已于“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要求,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正在从“个人”向“家庭”扩展,因此家庭政策的完善和改革势必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新中国成立伊始,家庭作为“私”成为“公”的对立面,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是个人福祉的主要来源,家庭的发展必须服从革命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强调家庭重要性的同时减少对家庭生活的干预,并形成一套包括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内容的、并不完备的家庭政策体系^[23]。我国的家庭政策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从政策手段上而言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政策框架。

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与老年问题研究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作为一种寻找农户生计脆弱性原因并提供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和建设性工具^[1],可以为研究农村老年家庭生计和福祉提供

研究借鉴。国外学者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生计多样性^[24]、生计脆弱性^[25]、生计安全^[26]、农户生计与扶贫^[27]及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28]等方面;国内学者在利用和研究分析框架上也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如在分析贫困和扶贫中的应用^[29-30]、对失地农民生计的研究^[31-32]、对退耕还林农户生计的分析^[33]等。还有学者根据分析现实问题的需要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展开相关研究,如在框架内引入家庭结构视角^[34]及将框架应用于农民工生计研究^[35]。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的生计^[2]以及生计资本视角下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比较^[3]是直接针对老年人生计和福祉可持续性的有益尝试,但并不是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系统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失地农民、农村农户生计及反贫困等方面,较少直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可持续性进行研究。

农村老年人家庭是有老年人的农户,因此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原则上也应适用于农村老年人家庭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农村家庭养老资本,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养老脆弱性与养老策略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不同家庭的五类资本在数量和结构上都可能存在差异,家庭结构特别是代际结构,直接决定了农户一些生计资本存量,可能造成不同的生计策略^[34]。我国农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养老资本、制度性支持、面临自然和社会风险等,其养老具有脆弱性。社会变迁导致的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转变必然导致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本(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数量及其组合方式的变化,从而使农村家庭养老脆弱性和养老风险增加,导致农村老年人生计和福祉的不可持续性。农村老年人养老策略实际上是农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计策略,农村养老问题实际上是农村老年人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问题^[21]。因此,脆弱性在反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方面的应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农村养老脆弱性提供了较好的借鉴^[21]。吸收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分析方法,并用以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计与福祉,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引入将有助于理解农村老年家庭养老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相关环境和养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并最终在实践上帮助构建中国农

村老年人的可持续生计与福祉。

第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以个人为重心的研究拓展为以家庭为单元的老年问题研究,从支持家庭的角度来改善老年人的福祉,是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领域的有效拓展。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是降低人们生计脆弱性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36]。对于老年人而言,生计资本是维持生活的基础,其生活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生计资本的综合作用与生计策略的不同选择。已有不同领域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个人的健康与福祉^[14-15],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福祉有重要影响。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有着直接的正面作用^[37],社会支持的质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38]。关于社会支持的提供者,配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的支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均有正面的影响^[39]。而在中国以及一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亚洲国家,家庭是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社会单元。尤其在中国农村,正式支持无法满足养老的需求,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就成为对老年人支持的主要来源。代际间双向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状况有积极影响^[40],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41]。同时,劳动力迁移使得外迁子女增加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同时,也造成了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福祉^[42]。而与老年人生活福祉密切相关的代际支持也会受到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儿子对停止工作后的父母提供了比女儿更多的经济支持^[43]。同时,家庭和社会支持可降低老年人的死亡率^[44];不同社会支持水平的老年人的孤独感、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差异^[45]。纵观国内外研究发现,以往研究基本上只关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福祉的影响,却忽略了对家庭照料者的关注。实际上,提高照料者自身的健康福祉和生活福祉,有利于照料者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服务^[46]。老年人家庭的生计与福祉问题具有脆弱性与多样性特征。老年人与家庭其他成员的代际关系随人口与家庭变迁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这不仅体现在伦理与道德层面,也表征在利益、机会与资源配置以及制度安排的矛盾与冲突上^[47]。因此,改善老年人福祉需要突破仅仅以老年人为中心的桎梏,同时关注其他家庭成员作为老年人家庭养

老潜在照料者的需求与支持,从而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的生计与福祉。

第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强调宏观政策实践与农户个体需求的联系,有利于剖析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与福祉可持续性方面的困境、问题和政策需求的同时,制定可操作性政策并指导实践。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使得农村老年人按照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逐渐弱化,探寻社会化解解决途径最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家庭支持政策。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重视家庭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分支,通过各项政策手段直接作用于家庭,使家庭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和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总体来说,中国直接或间接涉及家庭的政策数量并不少,大多专注于问题家庭(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计划生育家庭等)和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群体和个人^[47],只有“低保”政策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是专门以家庭为对象的政策。现有的老年支持政策主要包括收入保障和服务保障两个方面,具体政策包括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政策、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农村五保制度、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评估办法和标准,有关发展老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康复健身等服务的政策规定等^[48]。支持家庭,将家庭养老功能重新发挥出来,逐渐成为我国老年社会福祉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48-49]。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指导性框架,为老年家庭支持政策与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可操作性政策建议。

四、框架的提出

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生命历程视角,在图1所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了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祉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本框架首先识别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本现状与构成,评估老年人养老风险与脆弱性,进而探索老年人家庭利益与决策机制,剖析家庭养老福祉后果与支持需求,从而进行政策与制度的创新。

如图2所示,农村老年人的生计与福祉是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多维度时间背景下的动态研究。随着时间轴的延伸,老年人生计与福祉的动态演进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宏观历史趋势”、“与家庭成员生命历程阶段相关联的家庭生命周期发展”以及“个体发展”。“老年三代扩展家庭”是指由老年祖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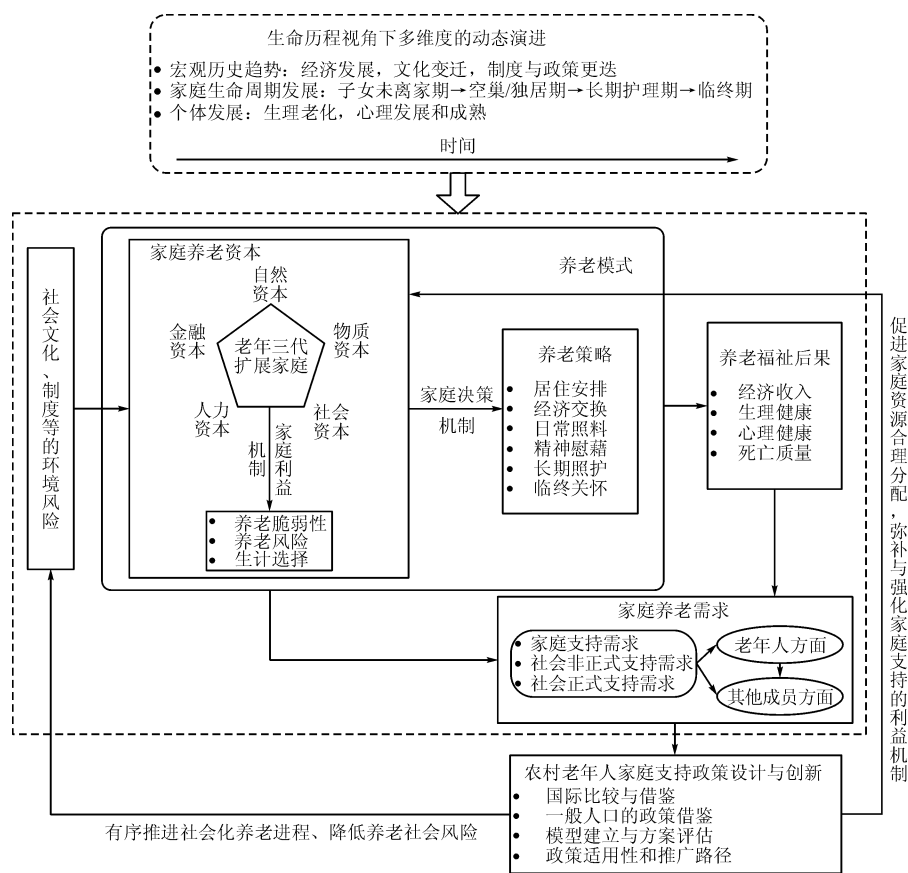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祉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所有成年子女及其所有孙子女三代成员组成的老年家庭,其成员不一定居住在一起,地理上也不一定接近。基于中国家庭至上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包括祖孙三代的所有直系亲属成员是利益相关的家庭策略的执行者。

人口和环境的动态性,多维度、多来源的养老资本构成,以及养老决策的成员间相互作用,决定了家庭养老模式识别、生计和福祉演进的复杂性。农村老年家庭养老脆弱性的降低和抗击风险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家庭养老资本以及组合方式,进而基于家庭利益和决策机制,产生不同的养老模式和策略选择,并最终决定老年人的养老福祉后果。老年家庭生计和福祉结果是动态的概念,受到家庭资产禀赋组合的约束,也受到家庭决策因素和制度政策环境的影响。而老年人家庭养老制度与家庭政策创新既可以通过有序推进社会化养老进程,从而降低养老的环境风险,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资源的合理分配,弥补家庭支持的利益机制的不足。

本文以农村老年三代扩展家庭的老年人生计与福祉作为研究对象,老年人家庭的养老模式是扩展

家庭在一定时期、一定内外部环境条件作用下由养老资产、养老支持策略所组合形成的内在特征,它反映了老年人家庭在经济、照料、情感等各方面的养老支持活动,并影响着生活福祉结果。基于该框架,计划将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老年家庭利益机制、养老决策机制、养老模式形成机制的研究,对养老风险及脆弱性、生计模式及动态演进、养老模式识别、生活福祉及动态演进、养老需求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梳理一般人口的公共政策和家庭政策,借鉴家庭政策的国际经验,提出农村老年家庭支持政策的备选方案和建议,并提出农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实施策略、步骤和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农村老年人扩展家庭养老资本与生计现状研究。计划通过定义与分析养老资本的类型、构成、来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养老资本间的替代、互补和因果关系,并识别养老资本中的瓶颈和关键缺失,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生计脆弱性与养老脆弱性的现状进行评价。从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养老资本的角度分析老年人生计及其脆弱性及养老模式和福祉的演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有助于系统地分

析养老模式和养老需求的深层次原因。养老资本不仅是可持续生计分析的核心内容,也是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的基础。不同类型的家庭养老资本构成了养老模式选择的前提。因此,定义与识别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本的构成与转换,分析与评价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养老脆弱性,对家庭生计动态性及养老福祉后果有重要影响。

第二,老年人家庭养老决策与养老模式的形成机制研究。计划从不同养老资本的相互影响关系入手,研究老年家庭成员的利益关系、决策过程和形成机制,从而探索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脆弱性的根源。家庭利益机制重点是解决老年人家庭的养老资本、时间安排、家庭成员的内部分工和资源配置。农村老年人家庭进行养老策略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家庭内部脆弱性的影响,还要考虑外部环境风险和支持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家庭抗风险能力的变化。

第三,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与福祉后果的动态演进研究。计划基于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资本形成与脆弱性识别来进行生计模式的识别,并比较生计资本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之间的差异,从而来研究微观层面上生计模式的动态演进。农村老年人家庭福祉后果的动态演进则通过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来研究,内部冲击如生命时间、人口变动等引起的家庭养老资本变动,外部冲击如政策、制度变迁等推动和影响的养老模式转变,都将造成老年人生活福祉的动态演变。家庭养老资本对养老模式选择的作用,养老模式和家庭生命周期变动之间的关系,养老模式转变对养老福利后果的影响都是研究的重点。

第四,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与养老需求的实证研究。计划通过定义和识别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揭示不同养老模式的脆弱性差异的表现,旨在明确其中的关键制约因素和优化其资本组合的各方面养老需求。养老脆弱性是我国农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养老资产、制度性支持、面临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风险而导致的老年人生活福祉方面的固有特征。农村养老脆弱性具有一定动态性,指的是农村养老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养老资本、养老能力以及养老环境等的动态发展。多种特征因素会影响农村养老脆弱性,包括个人人口特征、家庭拥有资本总量、保障体系水平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变等。对不同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的差异化分析,识别农

村老年人生存和养老可持续性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有利于针对性地改善不同农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计与福祉现状。

第五,农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体系设计。计划总结家庭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除老年人以外一般人口的家庭政策,在总结和归纳现有国家关于家庭政策体系的结构与特征的基础上,关注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问题。计划基于机制研究得到的因果关系链条进行政策设计,系统分析和探索通过政策创新实现政策供给和需求匹配的路径与方法,并构建相应的模型,对制度和政策方案进行评估,揭示不同制度和政策方案的组合对于家庭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不同政策和模式的适用性和推广路径。

该框架主要关键点与难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生计相关经验和实践,如何提炼出有关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本、生计和养老模式的科学内涵与关键要素,这是该框架的出发点和基础。其次,如何揭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利益机制和养老决策机制,构建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模型,这些改造后的模型如何实现可操作化和协调使用也是关键问题。第三,如何揭示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和养老支持面临的困境和需求。这些问题和需求涉及到不同方面和不同家庭成员主体,如何在各种问题和需求中识别和选择最关键、最迫切和最具影响力的问题作为突破点和政策抓手将是重中之重。最后,目前涉及到老年人服务管理的部门较多,在不同层面上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也相互交叉,在制定农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体系过程中,如何把支持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家庭政策与其他类型政策,以及与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是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五、展 望

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提炼有关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本、生计的关键要素,揭示在脆弱性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利益机制和养老决策机制,识别农村老年人家庭生计与养老支持面临的困境与需求提供了研究路径。笔者计划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团队历时 15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对该框架进行验证

与应用。该数据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和雪城大学合作,对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市、巢湖市和芜湖市的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纵贯抽样调查数据,已进行六次调查,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进行。该调查的主要目标是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基本特征、生计资本状况、家庭尤其是子女和孙子女代际关系、老年人的生活福祉状况(主要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等)。多年来,本人所在研究团队利用该数据对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健康福祉、临终照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该调查数据将为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本的界定与识别、养老决策与养老模式形成机制的揭示、养老脆弱性和养老需求的深层次分析提供数据支持,为制定农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体系提供现实依据。

以理论框架和现实依据为基础,后续研究将探索增强农村老年人个体或家庭能力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与福祉的家庭支持政策。家庭支持政策是以家庭整体为对象,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弥补和完善家庭功能。后续研究将采用“关键问题→影响机制→现实需要→政策制度”的研究路径,梳理农村老年人家庭面临的突出生计和福祉问题、不同层次原因和作用机制及其变化的新趋势,基于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因果关系链条,识别不同风险冲击和社会环境变化下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和各方面养老需求,进行农村家庭养老服务管理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为政策创新提供依据和着力点。

参考文献:

- [1] Robert M G, 杨国安. 可持续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22(1): 11-21.
- [2] 张会萍, 胡小云, 惠怀伟. 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人生计问题研究——基于宁夏银北地区的农户调查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3): 56-67.
- [3] 乐章, 鲁志敬. 生计资本视角下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比较——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的实证分析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6(4): 61-67.
- [4] 苏芳, 徐中民, 尚海洋. 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4(1): 61-69.
- [5] Carney D. Implementing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8.

- [6] Ashley C, Carney 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Lessons from early experience [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9.
- [7] Moser C. The asset-vulnerability framework: Reassessing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R].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8(1): 1-19.
- [8] 李斌, 李小云, 左停. 农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 [J]. 农业技术经济, 2004(4): 10-16.
- [9] 国家统计局. 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 1.68 亿人, 同比增长 2.9% [EB/OL]. [2016-10-25]. <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60415/4105591.shtml>.
- [10] 丁志宏, 姜向群. 城市老人住房状况及其满意度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1): 51-59.
- [1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5.
- [12] 央视网新闻. 首份《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研究报告》发布: 一年约 50 万老人走失, 失智为主因 [EB/OL]. [2016-10-25]. <http://news.cctv.com/2016/10/09/ARTIUQhPkv0fzhG4okA0zeXe161009.shtml>.
- [13] 姜向群, 郑研辉. 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其经济保障问题分析 [J]. 人口学刊, 2013(2): 42-48.
- [14] Gottlieb B H.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involving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M]. CA: Sage, 1981.
- [15] Jacobson D E. Types and timing of social support [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6, 27(3): 250-264.
- [16] Doraid M. Analytical tools for human development [R].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1997.
- [17] 贺春临, 周长城. 福利概念与生活质量指标——欧洲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概念框架和结构研究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2(1): 51-55.
- [18] 刘继同.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独特视角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2): 57-62.
- [19] 吴玉韶.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20] 潘金洪, 帅友良, 孙唐水, 张吟鹤, 薛晓华, 周长青. 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率及失能规模分析——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4): 3-6.
- [21] 于长永, 何剑. 脆弱性概念、分析框架与农民养老脆弱性分析 [J]. 农村经济, 2011(8): 88-91.
- [22] 胡湛, 彭希哲.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 [J]. 人口研究, 2012(2): 3-10.
- [23] 胡湛, 彭希哲. 老龄社会与公共政策转变 [J]. 社会科学, 2012(3): 107-114.
- [24] Smitha D R, Gordona A, Meadowsa K, Zwick K.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Uganda: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change across two rural districts [J]. Food Policy, 2001, 26(4): 421-435.
- [25] Hahna M B, Riedererb A M, Fosterc S O.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ssessing risks from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A case study in Mozambique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9, 19(1): 74-88.
- [26] Singh P K, Hiremath B 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ecurity index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 tool for development planning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0, 10(2): 442-451.
- [27] Ellis F. Livelihoods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Uganda [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6): 997-1013.
- [28] Soini E. Land use change patterns and livelihood dynamics on the slopes of Mt. Kilimanjaro, Tanzania [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5, 85(3): 306-323.
- [29]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等.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4): 32-39.
- [30] 李小云, 张雪梅, 唐丽霞. 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5(4): 67-74.
- [31] 杨云彦, 赵锋.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3): 58-65.
- [32] 李聪, 柳玮, 冯伟林, 李树茁.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西安康地区的调查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6): 31-44.
- [33] 黎洁, 李亚莉, 邵秀军, 李聪.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5): 29-38.
- [34] 李树茁, 梁义成, Feldman M W, Daily G C.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2): 1-10.
- [35] 靳小怡, 李成华, 杜海峰, 杜巍.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新领域: 农民工生计研究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1, 33(3): 103-109.
- [36] 许汉石, 乐章.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10): 100-105.
- [37] Krause N.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ated health in older adults [J]. Gerontologist, 1987, 27(3): 301-308.
- [38] 徐洁, 李树茁. 生命历程视角下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势及累积机制分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47-53+68.
- [39] 张思锋, 唐敏, 周森. 基于我国失能老人生存状况分析的养老照护体系框架研究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83-90.
- [40] 宋璐, 李树茁, 张文娟.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6(11): 1453-1455.
- [41] 刘慧君, 蔡艳芝, 李树茁. 农村老人生存质量与死亡风险中的家庭支持机制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60-69.
- [42] 左冬梅, 李树茁.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2): 93-100.
- [43] 左冬梅, 吴正.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2(4): 26-34.
- [44] 顾大男, 柳玉芝. 我国机构养老老人与居家养老老人健康状况和死亡风险比较研究 [J]. 人口研究, 2006(5): 49-56.
- [45] 陈长香, 冯丽娜, 李淑杏, 等. 家庭及社会支持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以河北省城乡老年人调查为例 [J]. 医学与哲学(A), 2014(2): 30-33.
- [46] Cameron I D, Agger C, Robinson A L, Kurrle S E. Assessing and helping careers of older people [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1, 343: 630-633.
- [47] 吴帆.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J]. 广东社会科学, 2012(2): 23-30.
- [48] 康乃馨. 基于家庭视角的我国老年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D].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 [49] 董彭滔. 建立健全中国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探析 [J]. 老龄科学研究, 2014(2): 10-17.

责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and Family Support Policy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LI Shuzhuo^{1,2}, XU Jie^{1,2}, ZUO Dongmei^{1,2}, ZENG Weihong^{1,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Center for Aging and Health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in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al socie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o rural elderly, then build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on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this framework analyzes the questions related to rural elderly including the formations and features of their vulnerabi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supporting mode, and explores the wa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building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on the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and family support policy.

Keywords: Rural elderly; Livelihoods; Well-be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Family support policy

Shadow Banking System: Credit Creation Mechanism, Inherent Instability and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WANG Jinyang^{1,2}, LIU Xiliang^{1,3}

(1. Chinese Finance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Financial Secur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By simultaneously considering the equity retention ratio, haircut ratio, and their heterogeneity and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redit creation mechanism, inherent instability and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It finds that the magnitude of the credit creation of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mainly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splitted saving fund and the multiplier of the credit creation. The latter is the decreasing function of the equity retention ratio and haircut ratio, and the change rate of the multiplier is the increasing function of them.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ank credit creation mechanism, this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 inherent instability from three aspects: funding fragility, information sensitivity of credit medium and leverage cycles. Not only the credit creation function has a procyclical characteristic, but also the amplitude is more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ank.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on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Keywords: Shadow banking; Credit creation; Inherent instability;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Optimal Selection of Monetary Instruments:

Based on DSGE Model

YIN Lei¹, YANG Yuanyuan²

(1.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estimates the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function by using Bayesian parameter estimatio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monetary policy tools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shocks by combining dynamic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regul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quantity rule and price rule regulation tool, and finally selects the optimal policy to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ice-based monetary policy can more effectively accommodate the impact of the aggregate demand and aggregate supply shock than quantitative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 which causes the minimum degree of economic equilibrium deviation.